

# 苏联的社会主义 农业



# 蘇聯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

原名

社會主義農業發展在蘇聯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聶傑林著  
祝璜譯

大東書局印行

一九五〇年七月初版

蘇聯的社會主義農業

每冊基價三·五〇元

外地酌加郵運包裝費

原著者聶傑

譯者祝

林瓊局

出版者大東書

局

印 刷 者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版權所有不  
印翻准

# 目 次

一 列寧—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政策的勝利	五
蘇聯國民經濟體系中之社會主義農業	一二
我國農業是世界上最巨大最機械化的農業	二〇
二 戰後時期中農業之發展	二五
聯共（布）中央二月中全會決議的實施	三四
三 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更進一步之發展	五三
米邱林學說在生物科學上的勝利	五三
改造自然的斯大林計劃	五七
發展集體農場公有牲畜與國營農場牲畜三年計劃	六五

# 蘇聯的社會主義農業

(原名社會主義農業及其在蘇聯國民經濟發展中之作用)

農業是蘇聯國民經濟最重要和生活必需的部門之一。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為人民生產糧食為工業生產原料，同時並確保國家必要的糧食與原料之貯備。

我國農業之發展是和工業及國民經濟其他一切部門之增長緊密聯繫的。

斯大林同志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大學的演說中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工業勞動者和農業勞動者的生產消費組合。在這個組合裏若是工業不和提供原料糧食及吸收工業品的農業聯繫一致，如果工業不和農業結成統一的國民經濟總體，那什麼社會主義都談不到了。」①

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中社會主義農業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為了由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就必須使我國有滿足的消費品和豐富的食品。祇有在這種條件下才可能由各取所值轉向爲各取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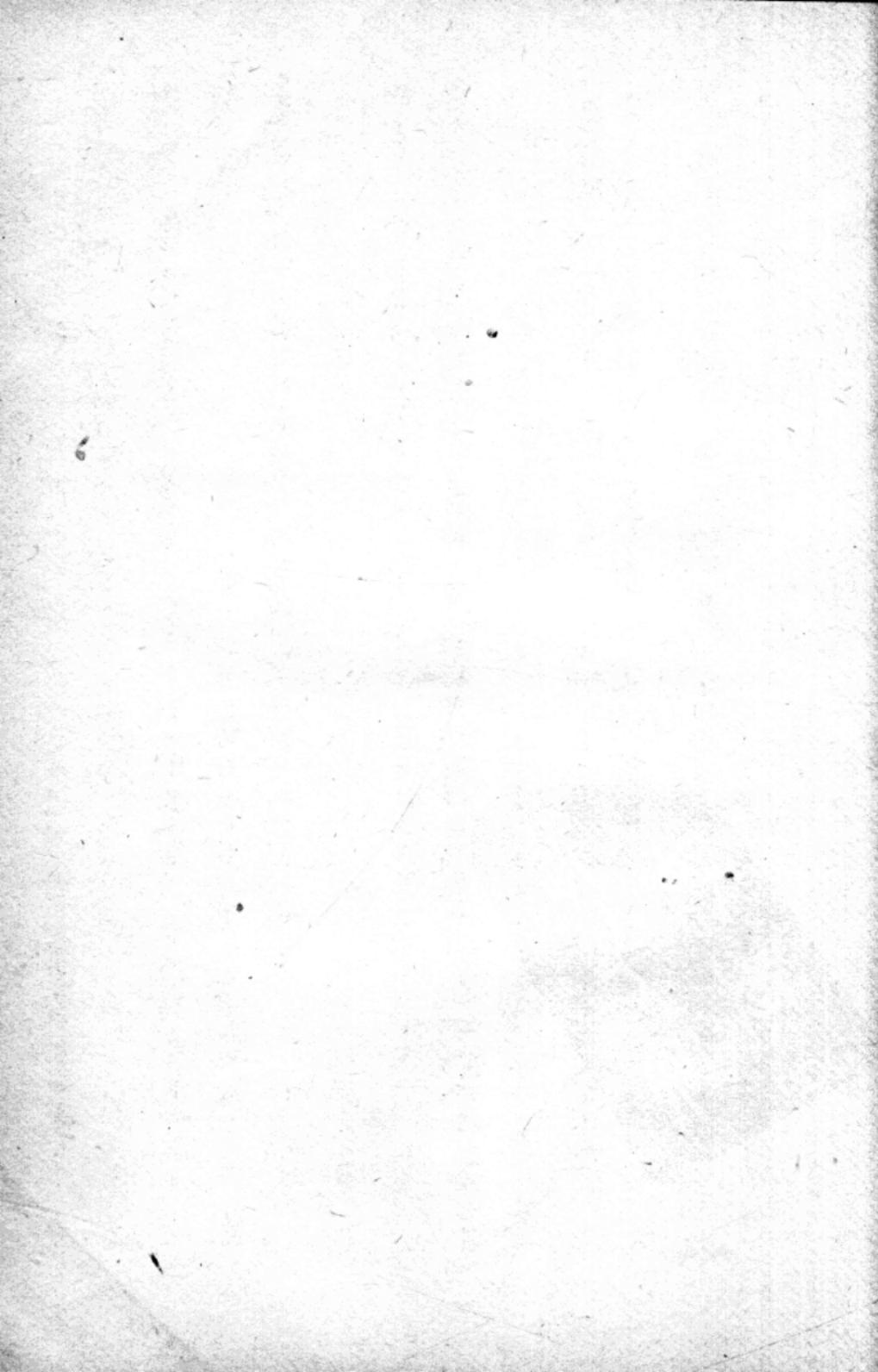
在戰後時期中我國重新開始爲完成偉大斯大林遠在聯共（布）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向蘇維埃人民提出的基本經濟任務而努力。國內展開了爲爭取國民經濟迅速恢復與向前發展的全民性運動。

農業在這種情況下有着巨大的任務——創造豐富的食品，確保輕工業的原料。集體農場農民、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的工作者曾以最大的熱忱爲完成這些任務並爭取一切日新又新的成就而努力。

城市與農村中蘇維埃人的每一新勞動成就，都是實現蘇聯基本經濟任務的寶貴貢獻。我們人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沿着建設共產主義大廈之路前進的勝利步伐。

集體農場農民、國營農場和機器拖拉機站的工作者每天都孜孜不倦地爲創造豐富的食物，爲增加工業原料的產量而奮鬥；爲爭取高度的穩固的收穫量，爲提高畜產的生產率而努力。

社會主義農業之所以成功應該歸功於我國的巨大社會主義工業，它以第一流的機械技術裝備了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社會主義農業的成功是集體化制度勝利的結果，是列寧—斯大林黨領導的結果。



# 一列寧——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政策的勝利

列寧—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政策的勝利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決定性條件之一。

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正如符·伊·列寧所指出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最艱巨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任務。

偉大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專制政治，消滅了資本主義制度，把農民由地主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使他們成爲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勞動者。依據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十月革命的第二天所頒佈的土地法令，農民無償地領得了一萬五千萬餘俄畝的新有土地，這些土地以前都是屬於地主、皇室、寺院、教堂和資產階級的。土地成爲全民的資產，不再是買賣的對

象。農民免除了每年繳納的約近五億金盧布的土地租金。

我國農業在十月革命以後分裂為細小的單位而且仍然是很落後的。不從小農經濟過渡到大規模的集體制就不可能使國家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寬廣道路，也無法使農民羣衆擺脫了貧困的境遇。符·伊·列寧指出：「如果我們仍舊依靠小農經濟來生活，那即使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資格來生活，也是不免要滅亡的。」①

列寧確示了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他創設了天才的合作社計劃，依照這個計劃我國農業的發展，應當是經過合作社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前進，應當是經過逐漸地把集體制原則灌輸於農業，起初灌輸於銷售方面，然後灌輸於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前進。

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和工農聯盟的條件下，在保證無產階級對這一聯盟實行領導的條件下，在社會主義工業存在的條件下，組織得正確而且包括有千百萬農民羣衆的生產合作制，就是可能用以爲在我國建成完滿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手段。

①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七頁。

以斯大林同志爲首的布爾塞維克黨，在毫不容情的殘酷鬥爭中擊破了托洛茨基份子、布哈林份子及其他人民公敵，光榮地保衛並實現了天才的列寧合作社計劃。斯大林同志發展了列寧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學說，創設並順利地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理論。

國內戰爭之後我國農業雖然迅速恢復，可是當時小農經濟仍然在農村中佔有優勢。由於土地私有制的廢除和土地無償交與農民使用之結果，農戶數量和革命前相比，已從一千四百萬至一千五百萬戶增加到二千四百萬至二千五百萬戶。這就是商品糧食產量極其低微的小農經濟。它們全部穀物產品僅約十分之一可能供應市場。

在一九二七年時，即使當時農產品的總產量已超過戰前水準，而穀物產量中的商品部分，至多也不過等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三十七。牲畜和工業農產物的商品產量也大爲縮減。所有這一切證明了農業之發展是遠落後於工業之增長。

農業落後之基本原因，正如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所指出的，是在於社會主義工業已經是以先進技術爲基礎按着計劃程序進行的巨大集中的工業，而小農經濟

技術的勞動組合和集體農場，最後進到裝備着幾百輛拖拉機和刈割機的巨大國營農場。」①

集體農場建設事業之所以獲得非常迅速的成功，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是因為我黨實行了列寧的羣衆教育政策，通過農業合作制的方法一貫地把農民羣衆引向集體農場。

斯大林同志更進一步指出，這個成功是因為蘇維埃政權正確地估計到了農民日益需要新式農具和新式技術的情形，正確地估計到了農民在舊式耕作形式下沒有出路的情形，也正因為它估計到了這一切，所以它及時給予農民很多的幫助：設立農具租借處，拖拉機隊和機器拖拉機站，組織共耕制，成立集體農場，最後並以國營農場的力量來多方幫助農民經濟。

集體農場建設事業的空前成功，亦是因為我國先進工人擔負起了這件事情。黨派遣了幾千先進工人到農村去。工人隊伍成十成百不等的散佈在我國一切主要區域裏。他們的工作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評價的，工人宣傳員是農民羣衆中間集體農場運動最好的宣傳員，是任何其他現有的和可能的宣傳員所不及的。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二六八頁。

在一九二九年，當農民羣衆已經走上集體化的道路，而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已經開始提供多於富農經濟的商品穀物時，我黨，堅定地依靠著貧農和中農，在全面集體化的基礎上從限制和排擠富農階級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斯大林同志指出：「爲要排擠富農階級，就要在公開的戰鬥中擊破這個階級的反抗，剝奪它所藉以生存，藉以發展的一切生產條件（土地自由使用權，生產工具，租地權，僱傭勞動權等等）。而這正是轉變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①

把農業勞動組合作爲是現階段集體農場運動的基本形式，這是斯大林同志的偉大功績。他指出：「勞動組合在現今條件下是集體農場運動唯一正確的形式。這是完全明白的：第一、勞動組合把集體農場農民個人日常生活利益與他們的公共利益正確結合起來；第二、勞動組合很恰當地把個人日常生活利益適應於公共利益，因而便利於用集體主義精神來教育昨天的個體農民。」②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二九八頁

② 同書第四六八頁。

由於集體農場制度的勝利，我們的農業從國民經濟過去最落後的部門，變成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裝備了第一流技術的農業。到偉大衛國戰爭開始時國內已經有二十四萬個以上的集體農場，四千餘個國營農場，約近七千個機器拖拉機站。

列寧—斯大林農業集體化政策和消滅富農階級政策的勝利，其歷史性意義是在於，「這是一個極深刻的革命轉變，是從社會底舊質態轉為新質態的突變，按其結果來說，它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是具有同等意義的。」<sup>①</sup>「這個革命一舉而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三個根本問題：一、它把我國人數最多的剝削者階級，即資本主義復辟支柱的富農階級消滅了。二、它使我國人數最多的勞動者階級，即農民階級，離開了產生資本主義的個體經濟道路而轉上了公共的、集體的、社會主義經濟道路。三、它在農業這一最廣大和生活必需，而又最落後的國民經濟部門中，給蘇維埃政權奠立社會主義的基礎。」<sup>②</sup>

①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二九一頁。

②同書第二九二頁。

## 蘇聯國民經濟體系中之社會主義農業

集體農場制度的勝利和國營農場的順利建設根本改變了我國經濟的面貌。

農業生產，亦像工業一樣，成爲巨大集中的，嚴格按着計劃並以現代機械技術爲基礎地在進行着。由於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組織我國堅定地進入了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的道路。

斯大林五年計劃年代中農業的迅速發展和增長，促成了全部國民經濟進一步的高漲，和城鄉勞動羣衆物質福利的提高。

由於集體農場制度的勝利社會主義農業在空前的短促期間就順利地解決了穀物問題。

在一九二八年，當時細小的個體經濟在農業中還佔優勢，我國總播種面積比起一九二三年祇增加八百萬公頃，而穀物播種面積甚至比前縮減。可是從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八年的時期中，由於集體農場生產的鞏固與發展，國內總播種面積增加了二千三百九十九萬公頃，而穀物

播種面積增加了一千零二十萬公頃與一九一三年水準的對比是百分之一〇八·五。在一九四〇年國內總播種面積已經是一億五千零四十萬公頃，而一九一三年是一億零五百萬公頃。

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的時候，國家已能每年從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獲得二萬萬至三萬萬生的納（Centner）商品穀物，而在個體農民經濟時期祇有八千萬至一萬萬生的納。

斯大林同志一九三五年在刈割機駕駛員會議上提出要達成每年生產七十萬萬至八十萬萬普特穀物的任務，亦即是超過沙皇俄國時代農業的穀物產量二萬萬至三萬萬普特。

爲爭取這一歷史任務的實現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在短促的期間內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九三七年我國穀物產量已達到七十三萬四千萬普特。一九三八年商品穀物的產量約有二十三萬萬普特，亦即是多於沙皇俄國時代的產量十萬萬普特。

由於穀物問題之解決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創設了發展工業農產物與牲畜飼養業的條件，這些也是非常重要且爲生活所必需的。斯大林同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刈割機駕駛員會議演說中指出：「……人的食料並不是只限於穀物一種。他們還需要肉類和脂肪。都市的

增加，工業農產物的增加，人口的普遍增加，富裕的生活，這一切都使得對肉類脂肪的需要增加……但是沒有爲牲畜食用的巨量穀物貯備，那畜產的增加就無從打算起。祇有增加和發展穀物的生產才能創設增加畜產的必要條件。」

牲畜飼養業發展的轉捩點是開始於一九三四年。其時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由於生產力的提高，各種家畜的飼養數目有了特別迅速的增加。從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間，蘇聯牛的數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綿羊和山羊增加到兩倍多，豬增加到兩倍半多。一九三八年牛和豬的數目已經超過了一九一六年的水準。國家在家畜購置上給了集體農場農民巨大的幫助。從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間利用國家的長期信貸而購置的牛和牛犢約有六百萬隻，豬和乳豬有一千二百萬餘隻，綿羊和仔羊有六百多萬隻。

由於牲畜的增加工業中心和城市人口肉類、牛油、牛奶及其他營養食物的供給有了大大的改善。到偉大衛國戰爭開始時國內已經展開了廣大的蘇維埃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它們充分的保證了蘇維埃消費者日益增長的購買力。